昆明学院学报　2018，40（5）：37～41，53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环境史】

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以《中国季刊》为中心的考察

刘雪利[1]，杨卫芳[2]
（1.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2.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当今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进一步改革发展的瓶颈。西方知名学者纷纷撰文研究中国环境问题。其中，《中国季刊》这一杂志集中反映了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诸多思考。统观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对中国环境问题治理成就的归纳以及对中国环境未来的展望和建议，可从“第三者”视角得出中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季刊；西方学者；中国环境；环境治理；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8）05－0037－05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8.05.007

The Problems of Modern Chinese Environment from Western Scholars: Taking *The China Quarterly* as an Example

LIU Xueli[1], YANG Weifang[2]
(1. School of Marxism,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92;
2. School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300350)

Abstract: Today's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the bottleneck restrict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form. Well-known western scholars have written articles 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mong them, *The China Quarterly* focuses on the thinking of western scholars on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moder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estern scholars' research, the induction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and the suggestions on the future of China's environment, the enlighten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can be dra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 party".

Key words: The China Quarterly; western scholars; Chinese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treatment; research achievement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创刊于1959年，是西方研究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杂志。第一任主编马若德是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生，其在《中国季刊》编纂过程中保持了高水准的要求。欧美著名学者裴宜理、施拉姆、沈大伟、托马斯·海贝勒等人纷纷在该刊物上撰文研究当代中国。《中国季刊》是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研究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杂志之一。本文在梳理《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2007年—2017年）环境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其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并由此得出了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一、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特点

《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始于1988年——中国官方决定三峡工程建设之

收稿日期：2017－10－24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30年欧、美、澳主要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评述”（13BDJ018）。
作者简介：刘雪利（1989—），女，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杨卫芳（1993—），女，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时，至 2017 年已经进行了 30 年，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中国自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许多严重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的环境问题也同样非常严重，而如今其环境已大为改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研究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季刊》西方学者自 2007 年以后的观点，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借鉴。

（一）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常态化”

2007 年至 2017 年这一阶段，《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章共有 17 篇（不包括 2013 年环境治理专题的 8 篇文章）。除了 2015 年之外，每一年至少有 1 篇，至多有 3 篇。（详见表 1）

表 1　2007 年以来《中国季刊》刊发中国环境论文统计

年份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发文量/篇	2	1	1	1	3	2	1	3	0	1	2

由此可见，2007 年至 2017 年这 11 年间，西方学者一直持续关注着中国的环境问题，研究显现“常态化”。特别是 2013 年举办的一次关于环境治理的专题研讨会，更是突出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视。实际上，《中国季刊》自其创刊以来，其西方学者大部分时段里的研究重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环境问题并非其关注焦点，但 2007 年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逐渐成为其刊出文章不可或缺的部分。毫无疑问，对中国环境问题研究的已经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种常态。

（二）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宽泛化”

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分析也一直都是与其他领域（如政府、经济、法律法规等）相结合而进行。《中国季刊》的刊发论文也不例外。下表 2 是有关 2007 年至 2017 年该期刊中讨论中国环境问题论文涉及其他领域的发文数量统计。

表 2　2007 年以来《中国季刊》中国环境论文涉及其他领域发文统计

涉及领域	法律法规	政府政策	人民群众	国际力量	经济发展
发文量/篇	3	9	1	2	2

如表 2 所示，这一阶段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并不单纯呈现环境问题，而是与其他领域问题相结合。其特点如下：1. 西方学者非常重视中国环境问题中政府的作用以及政治体制对环境问题的影响，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环境问题与政府的角色密不可分。2. 相较于政府，人民群众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研究较为薄弱。20 世纪末，中国非政府的环境保护组织逐渐开始建立，此后的十几年间此类环境保护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这在中国环境治理中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中国季刊》中的西方学者对此研究偏少。3. 随着 21 世纪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层次的深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国际因素，中国环境问题显然不仅对国内更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综上，无论多少，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已牵涉到方方面面。

（三）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时代化”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在内容上倾向于对某一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然后得出结论。就个案的范围来说，这些研究中既包括了沿海发达城市，又包括了西南地区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能够反映中国环境问题的现状。就研究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西方学者不总是披露中国环境治理中的弊端，相反，与 2007 年之前的研究相比，不少文章中透露出中国在环境治理中的一些值得继续推进的做法。在西方学者眼中，中国环境问题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就环境问题治理的来源看，西方学者不再像之前将视野限于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相反，将着力点放在了一些外力（如世界银行、国际会议）的助推作用上。而除了关注环境问题的传统治理手段（如政治体制变革、市场引导、民众道德意识提升）之外，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加入了不同地区的文明（如少数地区的文明、企业文明等）对环境治理效果的作用，并深挖这些文明中生态理念和生态价值。西方学者认为，这

是中国生态现代化进一步推进过程中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因素。由此可见，西方学者非常注重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时代性思考。

二、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治理成就的归纳

虽然中国环境问题仍相当严重，环境治理的过程依然较慢，但是上至中国政府下至普通民众，这几十年来都在为治理环境进行努力，中国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了较大的局部性成效。Robert W. Mead 在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环境清理和健康收益时了解到，北京为了争夺 2008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而进行了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环保项目，如垃圾分类、绿化带设置、各种植树活动，以及电力、照明和热水改用非化石燃料产生等[1]281；其 10 年来的环境治理带来的经济总效益达 500 亿元，包括空气潜在年增收 35 亿元，水年潜在增加 26 亿元[1]275。而 Alicia S. T. Robbins 在研究中国环境改革时指出，中国森林面积相对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国内和全球被誉为世界少数环境成功案例之一。[2]381 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治理取得成效还进行了如下归纳：

第一，互联网为环境运动提供契机。信息时代，互联网的引入和普及给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这一趋势，互联网和环境运动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期的中国进行结合，为环境改善做出了不少贡献。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环境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信息》2007 年关于环境行为主义的专题中。Seungho Lee 认为中国基于互联网的活动在环境保护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环保团体能够以低成本宣传其计划和活动，并组织在线和离线活动。[3]杨国斌（Guobin Yang）在研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中国政治中越来越明显的作用时，强调了互联网导致网络组织的诞生、绿色虚拟社区的出现，在这一社区内资源共享为环境运动提供了组织平台。[4]Jonathan Sullivan 在研究中国环境行为主义时认为：异议在中国网络中十分明显，互联网是“促进创造新的社会变革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的新闻和环境信息可促进讨论和沟通以及进行在线活动等行为；互联网和社交网都对环境行为主义行为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5]

第二，中国政府重视环境信息的强制披露。1999 年，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其后，受镇江经验的启发，2005 年 11 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 年升级为环境保护部）出台了“部长级通知”，引进技术指导原则，要求各城市对工业环境绩效进行评定。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其第二十七条明确要求省、市政府定期报告环境质量和生态活力信息，及时报告环境事故，为公众参与创造机会。2007 年 4 月 5 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开放政府信息公开法令一周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颁布了《环境信息披露（试行）办法》。Wanxin Li 在对镇江和呼和浩特两个城市的信息披露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此政策激励公众参与到环保行业清洁中，形成的镇江和呼和浩特经验成为很多城市学习的榜样。[6]

第三，地方领导人强有力政策推动。这是 Yuwai Li 在对苏州县级城市研究后得出的启发性结论。1997 年国家启动了环境保护模范城评选，到了 2011 年已经出现了 67 个城市，5 个城区达到了“模范城市”的标准。以第一个城市张家港为例，1992 年至 1998 年秦振华任张家港市委书记时期，根据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作为乡镇领导的经验，以及在帮助当地化工行业升级方面所做的工作，他将环境视野提升到了城市，实现了“黄金和白银”（金山银山）（经济收益）与“绿水和青山”（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为此，除了严厉制止企业污染和进行公共宣传教育外，在决策时还对环境问题和经济机会同等重视，实行“一票否决制”。这些努力都帮助张家港成为全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并形成了“张家港精神”，创造了“张家港速度”，同时也引导了昆山、太仓和吴江等更多城市加入“环境保护模范城”计划中。[7]

第四，国际力量的介入。Robert W. Mea 认为中国宣布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时，北京选择了“绿色奥林匹克”主题，表明主办奥运会将成为促进环境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1]275 显然，在国际性大赛的影响下，背景的环境问题才有这么好的治理效果。May Tan-Mullins 在世界银行对浙江慈溪湿地项目的研究中揭示出“外来因素”如何对中国的能力建设产生深远的积极影响，国际行为者如何导致成功引进良好的环境治理。Heggelund 则强调，国际层面的介入对提升中国环保意识非常重要，并最终得出结论——良好的环境治理同时需要包容非官方

环境活动如全球基金的协助。[8]

三、西方学者对中国环境治理仍需努力的几点建议

中国的环境治理虽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进展和成果，但是距离环境彻底改善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中国季刊》中的西方学者在对当代中国环境治理取得成就的原因和环境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注重维护环境正义

Alicia S. T. Robbins 在对中国森林面积大幅增加进行肯定的同时，认为对中国国内来说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村生计，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以及增加森林产品制造和建筑部门的产出。对全国大多数农村居民来说，林业对农民收入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因此提出只有通过增加现金收入来改善农村生计。他还指出：依赖森林的社区继续成为中国最贫困的社区，经济发展仍然远远落后于沿海和城市地区；国家促进土地使用权改革，试图在确保重新造林和高品质森林的同时提供收入，这两个目标并不总是相容的。[2]403另外，贫困地区为了改善环境而必须牺牲发展经济的机会，这一现实问题造成的不公平，成为环境改善工作能否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必须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民族构成复杂。中国民族地区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各民族的民族情怀。Thomas Heberer 在 2014 年对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案例分析时发现，当地的彝族经常因地方环境退化而被指责，而一些彝族学者则认为彝族有悠久的生态与自然保护传统，不应该为环境退化负主要责任。如何处理好这些情绪对环境治理十分重要。他认为：国家通过“灌输”战术和运用纪律处分手段来实现“文明使命”，中央采用具体技术来指导当地领导干部的文明和环境行为，并将每个人的文明和环境行为输入给“内部的权力”，这改善了生态状况；这一措施结合当地政府对于彝族有部族或族裔关系的把控，能够带动少数民族的环境治理决心，从而达到良好的环境治理效果。[9]

（三）发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Björn Conrad 在研究中国气候问题时认为，中国试图通过气候正义的论据来提出这一挑战，指出发展中国家享有经济发展的道路不受发达国家过去所逃避的生态责任的阻碍。这些观点不可否认的优点就是使中国能够很好地将其与国际义务隔离开来，而不会失去太多的声誉。[10] May Tan-Mullins 在评估中国利益相关者在亚洲和非洲大型水电项目中的行为时，承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外水坝建设者，为中低收入国家开辟了就业机会。巴黎环境能源署（IEA）的一位官员说，水电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减缓战略之一，其优势包括防洪、技术进步和创造就业。但同时，May Tan-Mullins 认为，中国的利益相关者需要重新考虑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的环境影响，处理好社会和能源正义、环境保护和恢复以及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问题。[11]

四、西方学者的中国环境研究给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宽阔，研究内容根据真实案例而来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呈现出来的结果也大都对中国的环境治理有所启发，当然其中也存在糟粕之作。单就启示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主要内容：

（一）我国环境研究必须突破学科之间的障碍

《中国季刊》中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与中国国内有较大差别：西方学者的文章中能够将最新的评估环境治理的先进技术融入其中，做到跨越文科和理科的障碍界线，其可读性较强。而相比之下，我国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比较分裂：首先，从学科专业来说，大部分院校是将环境专业放在环境学院或工科性学院，其主要研究的是技术性的，如水污染的技术处理、大气的技术检测等。而在理论层面上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则客观上又偏重于人文社科，如探讨某位哲学家的生态思想、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思想、环境教育等等。这样的局面造成了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环境治理不能脱离理论研究，但同时应更重视可操作性的实践。两者的脱节只会让环境的根治障碍重重。实际上，环境研究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

（二）环境治理必须嵌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

环境治理融入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主要是指将环

境治理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文明等相融合。

1. 将“生态理性”贯彻到国内企业中

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其也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成员等各方面。虽然 Wai-Hang Yee 在评估广东利益相关者和环境管理实践时认为，生态问题逐渐在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上立足起来，但是在国内的市场经济中，绿色在很多时候被看作市场策略，国内一些企业的趋势主要是使用环境来实现经济目的。根据 EMT（评估欧洲大陆环境治理的前景）指标，现代社会资本的内在动力，可以调动各种市场主体，也可以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携带者”。中国的大多数公司将绿色环保作为对环境承诺，而将生态制度化为中国经济结构仍旧很弱。[12]

2. 注重环境治理中对地方文明的借鉴

鉴于地方文明在地方价值观、风俗习惯、道德情操、信仰和各种制度中的特殊作用，环境治理不能仅以改善环境为目标，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能将生态纳入地方文明中。Nimrod Baranovitch 在对内蒙古境内的环境活动进行研究时认为，内蒙古的知识分子早已经将环境问题、民族政治和民族身份认同结合在一起，并试图从环境问题找出内蒙古境内的活动的原因。而 Tomas Heberer 对四川彝族自治州的案例正好相反，在彝族生态文明的构建过程中，上级政府注重引导政府官员对彝族文明的借鉴，因此把彝族文明用于环境治理，在避免冲突的同时改善了环境。甚至 Wai-Hang Yee 在研究企业行为时也认为，模范公司的许多做大来源于儒家意义上的仁慈，并推断文化背景是中国生态现代化未来研究的热土。

（三）中国环境问题的未来依靠“信息环境治理”

信息环境治理这一说法比较新颖。但早在 1990 年美国民众对雷神公司进行臭氧破坏化学品排放的公开问责中，相关的信息披露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1999 年开始实行环境信息披露，并逐步将这一政策制度化；2004 年中国实施实时监测设备安装，并责令环保部门和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定期交流他们的相关排放数据；2008 年环境信息披露法律生效，中央以信息披露的方式推动地方政府的透明度建设。截止到 2017 年，我国环境信息的采集量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但是对于这些信息的管理则需要采用突破常规管理的新思维。2015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系统部署大数据发展工作，我国开始步入大数据时代。依托科学管理，大数据能够为各行各业提供决策信息支持。Matteo Tarantino 在研究中国的软件、环境保护和数据流时针对三者关系用绿色数据库对其进行了概括，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中央政府为促进信息的收集、管理和披露而推动提高环境透明度，与此同时中国的体制分权化也体现在缺乏集中的信息披露标准，从而使地方行为者的空间和自主权力能够选择和制定自己的软件设计及标准。[13]在信息治理下，引导民众更多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这样才能够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形成制约和监督，从而变国家的生态计划为民众的生态自愿行为。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环境问题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逻辑思维的烙印。鉴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西方有比较大的差异和差距，其有些看法在国内不一定适用，或者是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要有所差别。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不能完全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国家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这是中国环境治理重要原则之一。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国家环境治理的效果有目共睹，其先进的技术和环境理念值得借鉴和学习。《中国季刊》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国际知名学术刊物，其发表的西方学者有关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具针对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MEAD R W, BRAJER V. Environmental Cleanup and Health Gains from Beijing′s Green Olympics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8 (194): 281.

［2］ ROBBINS A S T, HARRELL 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Forests in the Reform Er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14 (218): 381.

［3］ LEE S.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Shanghai ［J］. China Information, 2007, 21 (2): 269.

［4］ YANG Guobin.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J］. The China Quarterly, 2005 (181): 46 – 66.

（下转第 53 页）

殊教育资源的信息和数据共享。同时，借助这个平台政府可以加强教育、卫生、民政、残联等多部门的合作，实现各部门间的资源协调与整合，推进多部门合作机制的建立，增强政府的统筹能力。除此之外，在县区级地方层面，应由县区级政府牵头建立融合教育工作协调系统，明确不同部门的权责利以及隶属关系，成立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加大区域内融合教育的多方合作。

（六）大力支持学前融合教育

《残疾人教育条例》提出："支持对学前残疾儿童的早期干预、早期康复和早期教育，普通幼儿园接受残疾儿童实施融合教育，为就读的残疾儿童提供适当的教育和康复训练。"目前，随着入园率不断提升，特殊儿童在幼儿园以及早教机构接受融合教育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教育部门要和残联通力合作，加大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支持，对办得好的学前教育机构给予财政补贴，鼓励学前教育机构开展融合教育。此外，建议将昆明学院附属幼儿园建设成为融合幼儿园省级示范基地，以此带动整个云南省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昝飞．融合教育理想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6：5.

［2］残疾人教育条例［EB/OL］.［2018－05－02］．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2/23/content_5170264.htm．2017－02－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8－07－19］．http://www.moe.edu.cn/jyb_sjzl/sjzl_fztjgb/201807/t20180719_343508.html.

［4］云南省 2016/2017 学年初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8－06－15］．http://www.drjyjt.com/list1_show.asp?id＝448.

［5］云南推动特殊教育快速发展［N/OL］．云南日报，2015－10－05［2018－06－02］．http://ylxf.yn.gov.cn/NewsView.aspx?NewsID＝118994.

［6］云南特殊教育现状，特教教师缺口已达 4000 多人［EB/OL］.［2018－06－02］．http://yn.news.163.com/16/0403/09/BJNF2EHH03230LFM.html.

（上接第 41 页）

［5］SULLIVAN J，XIE Lei．Environmental Activism，Social Networks and the Internet［J］．The China Quarterly，2009（198）：432.

［6］LIWanxin．Self-Motivated Versus Forced Disclosure of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in China：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he Pilot Disclosure Programmes［J］．The China Quarterly，2011（206）：351.

［7］LI Yuwai，MIAO B，LANG G．The Local Environmental State in China：A Study of County-Level Cities in Suzhou［J］．The China Quarterly，2011（205）：115－132.

［8］TAN-MULLINS M，GUANGLI G C．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Aid in the Chinese Context：A Case Study of the World Bank's Cixi Wetlands Project in Zhejiang Province［J］．The China Quarterly，2012（212）：1017.

［9］HEBERER T．The Contention between Han "Civilizers" and Yi "Civilizees" ov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Liangshan Prefecture in Sichuan［J］．The China Quarterly，2014（219）：736－759.

［10］CONRAD B．China in Copenhagen：Reconciling the "Beijing Climate Revolution" and the "Copenhagen Climate Obstinacy"［J］．The China Quarterly，2012（210）：435－455.

［11］TAN-MULLINS M，URBAN F，MANG G．Evaluating the Behaviour of Chinese Stakeholders Engaged in Large Hydropower Projects in Asia and Africa［J］．The China Quarterly，2017（230）：464－488.

［12］YEE W H，WING-HUNG LO C，TANGShuiyan．Assessin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Stakeholder Demands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Guangdong Province［J］．The China Quarterly，2013（213）：101－129.

［13］TARANTINO M，ZIMMERMANN B．Database Green：Software，Environmentalism and Data Flows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17（229）：205－217.